

珠海文史

第二輯

珠海市政协文史组编印

96.5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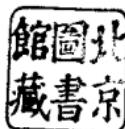
24

A226.53
102

珠 海 文 史

第二辑

珠海市政协文史组编印
1983年11月



B 073671

稿 约

一、本选辑为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参考刊物，印行的目的在于发掘和抢救历史文化遗产，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和编修地方志提供素材。

二、本刊征稿范围，重点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华侨、社团活动、重要人物、乡土风俗等方面，不论是全国性或是地方性的，凡有资料价值的，都在征集之列。本刊选登的资料要求以撰写者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主，史料力求真实。

三、来稿不拘体裁，不拘观点，不求完整，稿件刊登时，本刊编辑组有删节整理之权。

四、来稿不论采用与否，概不退还，如需退稿者请加以说明。

五、来稿凡有资料价值者，均酌给资料费，稿件一经刊登即致薄酬，并赠送本辑一册。

来稿请交政协珠海市委员会文史组。

目 录

稿 约

- 苏兆征同志革命事略 市党史办供稿(1)
我所知道的杨章甫 杨青山(11)
前山中学校史溯源 苏鼎常(14)
香洲蚝业简史 张火兴 黄谭庆口述
何志毅整理(27)
林则徐留迹先锋山 李大节(32)
前山“石将军”记 李鸿波 周英才(35)
兴中会员容星桥生平记述 唐仕进(38)
唐家湾著名武师唐家六轶闻 唐益连供稿
林世敬整理(47)
沈亚米义刺亚马喇 何志毅(57)
交通大学的容闳纪念堂 唐仕进(60)
容闳生平大事年表 谭沧溪(62)
三灶岛与它的“扯旗山” 唐振雄(71)
“鸡啼石”的传说与鸡公山的得名 管荣光(72)

苏兆征同志革命事略

市党史办 供稿

苏兆征同志（1885—1929）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在中国共产党内，他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1929年病逝。

（一）

1885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淇澳岛（今珠海市唐家公社淇澳大队）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弟姐妹七人，排行第二。父亲苏赋，字厚荣，当过地主的雇工，后以租佃地主土地耕种为生。苏兆征从小参加农活，砍柴捕鱼、替人放牛，养成了刻苦耐劳和俭朴的品格。

淇澳岛座落于珠江口，邻近香港澳门，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清朝初年，岛上的钟宝将军参与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战争，其事迹广为流传、家喻户晓。鸦片战争前，英国殖民

者想霸占淇澳作为贩运鸦片的基地，受到淇澳人民的英勇抗击，不得不赔偿白银三千两。这些斗争事迹对苏兆征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境贫寒，苏兆征只读过三年私塾，但他聪明好学的品质很受老师王步千的喜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青年时代起，苏兆征离岛外出谋生，到外国人的轮船上做工，渐渐接触到新思想，并产生了反抗社会的要求。他有时因为失业，不得不又返回家乡居住。每次返乡期间，他总是带领岛上群众与豪绅和习惯势力展开抗争，在乡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老师王步千的协助下，苏兆征与村里农民钟海昌等组织了一个阅报社，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自治会组织，他在这个组织上介绍了他在外地的所见所闻，介绍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事迹，大大打开了农民的眼界，启发了农民群众反抗地主的觉悟。为了与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他积极宣传破除迷信、改革旧风俗、主张剪辫子、反对奉神信鬼、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他常常跑到岛上各个村落演讲，有时一去就是一整天，连饭也顾不得吃。这种不辞劳苦，为民众办事的精神，使家乡群众深受感动。

为了给岛上的群众谋利益，苏兆征带领村里的青年开展植树活动，栽种了一批松树。他组织了一个种植公司，带头认领了股金十股，父亲也认了三股。树木成材后，他把所得收入都分给其他人。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诚恳，关心群众疾苦，群众把他当做贴心人。

苏兆征在家乡的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仇恨，他们串通官府，对他进行陷害。他与他的老师王步千被反动民团抓

进监狱，他坐了一年牢，他的老师病死狱中。反动势力的迫害，更加激发了他反抗旧社会的决心，出狱以后，他来到村外的一座“义士墓”前摔碗宣誓：“我要继承义士遗志，同社会的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二）

1903年，年仅十八岁的苏兆征，开始离乡别井，到香港的一艘外轮上做工，后来又到“乐生”、“塔夫总统”号当杂工。悲惨的海员生活，使苏兆征深感人间生活的不平，激起了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仇恨，逐渐坚定了反抗资本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信念。

香港是孙中山早年从事民主革命的基地。他的活动在海员中广有影响。孙中山奔走海外，经常接触海员，由此得以与苏兆征认识。由于苏兆征与孙中山同为香山人，语言相通，思想交融，双方无所不谈。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08年，苏兆征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成了民主革命的一名战士。不久，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海员联谊社、海员公益社等组织先后成立，苏兆征与林伟民（珠海市三灶岛人）都参加了这些爱国组织。这些组织筹集经费、偷运军械回国，支持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等活动，苏兆征、林伟民都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苏兆征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远航欧美，到过俄国的海港——海参崴，了解到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解放的情况，并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认识了工人阶级自身的革命力量。于是，他与林伟民一起，开始领导海员进行了有组织的斗争。

1921年3月，在苏兆征、林伟民的积极活动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工会组织之一。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广大海员开展了一系列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各轮船公司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头剥削、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等要求。这个要求受到轮船公司的拒绝。在苏兆征、林伟民的带领下，于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举行大罢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香港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罢工人数从三万人增至十万人，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罢工持续了五十六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苏兆征和林伟民虽不是海员工会的会长，却是这次罢工的实际领导人。苏兆征被选为设在广州的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后来又被推为代理工会会长。他代表罢工工人与资本家进行谈判斗争，坚持原则，不为资本家高压所动摇，不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大煞了资本家的威风，大长工人阶级的志气。从此，苏兆征成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公认领袖。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革命斗争的考验和党的教育下，苏兆征同志从一个海员工人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早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苏兆征和广大海员工人就受

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上海工人拒绝应招赴香港做工，以行动支持海员罢工。党又委派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大大地鼓舞了海员的斗志。苏兆征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于是产生了入党的要求。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成了革命根据地。陈延年、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常派遣党员到香港活动，通过与党的多次接触，苏兆征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地提高。1925年春，苏兆征代表香港工人团体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认识了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党的教育下，苏兆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位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英勇战士。

国共合作期间，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对清除广东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完成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支援东征与北伐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参加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并正式参加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在这次大会上，林伟民同志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为副委员长，苏兆征同志为执行委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我同胞的“五卅惨案”。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支援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香港、广州二十五万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是国际工运史上罕见的壮举。罢工使英帝国主义受到了

巨大的打击，香港工人响应罢工委员会号召，从香港回到省内，使香港一下变成了“死港”、“臭港”。香港总督也在罢工的打击下被撤职。

苏兆征同志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同志的协助下，团结了香港的一百多个工会，说服了这些工人的上层人物，团结一致，共同罢工。由于苏兆征同志在香港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各工会都消除偏见，愿意罢工。在苏兆征的带领下，香港的海员、电车工人首先罢工，以响应省内的工人斗争。

省港罢工受到了廖仲恺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民政府组织了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廖仲恺担任了罢工委员会顾问，苏兆征同志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财政委员长。

苏兆征带领广大工人群众，坚决支持国共合作，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8月，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被反革命买凶暗杀。苏兆征义愤填膺，以罢工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敦促国民政府肃清奸细，惩办凶手。他还带领工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在我党的极力主张以及工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采取了革命行动，处置了一批与刺杀廖仲恺有关的右派分子。国民政府得以转危为安。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的战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林伟民同志已患病住院，他极力推荐苏兆征同志。到会代表高度赞扬了苏兆征在工人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一致选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准备了条件。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苏兆征同志领导全国总工会，也迁往武汉。1927年3月，苏兆征与谭平山接受我党的委托，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谭平山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同志还担任了武汉市政府委员。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恐慌，在帝国主义与官僚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其反革命面目也日益暴露，在革命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武汉举行，大会发表宣言，谴责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宣布“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坚持斗争到底！”在这次大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加剧，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分共”。在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刻，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联合发表了辞职书，严斥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为，与此同时，苏兆征当机立断，将劳工部十万余存款取出，发给武汉失业救济所，用以救济失业工人。此后，苏兆征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英勇卓绝的斗争。

（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苏兆征同志面对白色恐怖，不畏强暴，出生入死，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

1927年4月下旬，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对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实行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斗争的正确意见。苏兆征同志在会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任弼时、瞿秋白、张太雷、彭湃等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大会仍在陈独秀的把持下，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时，共产党没有力量回击，终于使大革命导致失败。

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屠杀。七月中旬，党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着手筹划南昌起义。苏兆征同志接受党的指派，动身到九江等地，作工人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对支援了这次起义作出了贡献。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起义成功后，苏兆征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工作的总方针。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严正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撤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建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瞿秋白等九人当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等七人，当选候补委员。苏兆征同志同瞿秋白、李维汉同志一起，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苏兆征同志为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日夜奔忙，他化名黄先生，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为掩护，往返

于上海与武汉之间，有时又化装为海员工人，亲自到码头各地，直接联系工人群众。为了使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工人运动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他亲自主持了秘密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提出了在白色恐怖下工人运动的新意见。为会议所接纳。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同时张太雷、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也在筹备中。苏兆征在上海参加了广州起义的筹划工作，虽然因工作的需要，苏兆征同志未能直接赶回广州参加起义，但是由于他在广东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仍然被当选为起义中诞生的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未到职前由张太雷同志代理）。

1928年3月，苏兆征同志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同年8月，共产国际举行第六次大会。苏兆征同志先后三次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在这次会议上，苏兆征同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农村国际的副委员长。在苏联期间，他和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兆征同志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五）

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忘我紧张的工作，大大损害苏兆征同志的健康。他积劳成疾，并患上了阑尾炎，医生建议他留在苏联休养，等身体恢复后再施行手术。但苏兆征同志一心惦着国内的革命事业，不顾医生的劝阻和同志们的挽

留，毅然抱病回国。

1929年初，苏兆征同志回到上海，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虚弱有病的身体，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2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扩大会议，苏兆征到会报告了他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情况，并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会议刚刚结束，他终于病倒了。

尽管病情严重，苏兆征仍然关心着党的利益，他向组织隐瞒着自己的病情，以免增加党的负担，直到生命垂危时刻，仍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自己的家属，家人只好自想办法，把他送到一家私人医院进行抢救，但已经为时过晚了。

党中央获悉了苏兆征同志病倒的消息。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赶到医院看望他。1929年2月25日，党的优秀儿子苏兆征同志，终于与世长辞了。

苏兆征同志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三十二号通告，沉痛哀悼苏兆征同志。通告说：苏兆征同志“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同时，团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了悼念通告。在白色恐怖的弥漫下，不可能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但是各地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怀念这位党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外，十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也为苏兆征同志默念致哀。1930年2月，在苏兆征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出版了纪念册。

苏兆征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我所知道的杨章甫

杨青山

杨章甫（1894—1977）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骨干。我与他是同乡，在大革命时期，我们都在杨匏安烈士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彼此时相过从，情况比较了解。杨章甫曾对广东大革命时期的工运工作做出不少的贡献。兹将其革命事迹及生平概况忆述如下，以供参考。

杨章甫，原名仕端，别字林祥。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北山村（今珠海市南屏公社北山大队）北山村位于香山县婆罗岛的南端，与澳门一水之隔。

杨章甫父亲名训秩，一妻三妾，生下四男四女，章甫是正妾吴氏所生，排行居长，自小跟父亲到福州经商，其父受雇于玉记茶庄。不久，因生意不景，玉记茶庄倒闭，举家迁返故乡。当时章甫已十五岁，同杨匏安在前山恭都学堂就读，后来又同到广州广雅书院继续学习。他与匏安份属叔侄，（他大匏安两岁）日夕相处甚笃，是一双好同伴。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崛起为东亚强国，从而引起世界人士的注目。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途径的，有的是企图日后好捞

一官半职来镀金的；也有不少是反袁志士、革命党人，在本国站不住脚，流亡到这个岛国来的，如孙中山，廖仲恺等。

一九一六年，杨章甫和杨匏安在东渡游学的热潮中，来到日本横滨，寄居在康有为亲戚的家里。屡次托亲戚介绍职业，均未遂，又无钱进学校，只好整日到图书馆自行阅读，刻苦学习日文，有时和匏安进行翻译工作。

一九一六年初，章甫猝获父亲病危的急电，随即遁归祖国。当他抵达家门时，父亲已奄奄一息，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自父亲死后，章甫便负起家庭的责任，一家十口，生活十分困难，七个弟妹又要攻书求学。迫得在澳门设塾，名为“振提寄庐”，招收一些殷富子弟入学，征收学费以充家用；同时也可教育七个弟妹读书。他在澳门教学时与一个姓文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二男二女，人口增多，负担加重，所收学费入不敷出，经济拮据。这时，匏安知其困境，即介绍他在广州培正中学及华英中学任教，后又援引他在粤汉铁路广州分局充当编辑，（当时匏安是编辑主任）。章甫遂结束“振提寄庐”，全家迁往广州越华路杨家祠（旧省长公署左侧），与匏安同住一起。章甫自父亲死后，生活日趋贫困，而身处在这个黑暗腐败的社会，茫茫人海，苦无出路，曾经心情沉闷忧郁，一度意志消沉，有皈依佛法之念。但经过“五四”革命风潮及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又在匏安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启迪下，他的思想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识到要解决自己的贫困和人民的疾苦，非振奋革命斗志推翻旧社会不可。他渴求有一个革命组织来进行革命运动，其时幸逢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成立了党支部，章甫遂于一九二二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就利用铁路局编辑的合法身份，与杨

匏安、杨殷、潘兆銮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经过他们深入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广州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人们曾发起一系列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制定劳动保险条例，改善卫生安全设备等，大部分条件在斗争中都得到实现。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铁路系统的粤汉、广三、广九三个党支部先后成立，对进一步发动工人支援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广东最初的党支部设在越华路杨家祠，党员们经常在此开会。当时中共还是半公开的地下党，所以在杨家祠以设立“注音字母讲习所”作掩护。这也是一个宣传机构。该所是由章甫主持。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举行，章甫也曾列席并参加大会工作。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杨匏安参加了国民党政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后，铁路局的编辑主任一职改由章甫承担，并领导铁路的党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章甫逃到澳门，遵照党的指示，在澳门设一联络站，收容一班逃亡的革命同志，并负责印刷《红旗周刊》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迁居香港搞地下工作。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间，曾在中山三乡桥头学校，桂山学校执教。（他改名文磊庵）一九三〇年八月间，潘兆銮同志在桂山学校被捕牺牲后，章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重返香港，当了殷富人家的家庭教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病逝香港，终年八十三岁。